请交换

2|10

四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资料室



内江市市中区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目　录

回忆1946年内江庶农反超额剥削斗争……张幻石（1）
青年时代的范长江……黄剑庆（7）
宋自节在内江县中……朱　英（25）
内江归来……周永林（27）

内江风物

杨升庵与内江……绵阳圣（29）
内江艺坛往事……梅　英（34）
八、“一个童叟”　柯璜……（34）
九、秫湖池畔老书法家——谢保南……（35）
花鼓杂技艺人邱兆彬……蒋正伦（37）

封面　太白楼　何秀松　摄
封三　柯璜题梅英画梅　梅　英　供稿
　　公孙长子书横幅四幅　黄江陵　供稿
封四　公孙长子双钩条幅　黄江陵　供稿

回忆1946年内江蔗农反超额剥削斗争

张匀石

一、沧海微波——明斗

已经是近四十年的事了。长期天涯浪迹，远离故里，在1946年我回到已别十余年的故乡内江。那时正值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又加紧准备大打内战，弄得民穷财尽，国力空虚；又接连三年遭受旱灾，内江农村凋敝，四野荒芜，一片凄凉景象，令人目不忍睹。而地主、糖坊老板、高利贷者，乘人之危，对农民更加残酷压榨剥削。内江是蔗糖之乡，蔗农赖以为生、辛勤种植的甘蔗竟以贱价指卖。往年一万斤甘蔗，市价为三十万元，而1946年却被压价为十二、三万元，甚至低至八、九万元。农村经济已临破产，农民已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何堪再加摧残！如此下去，势必造成壮者之四方，老弱转沟壑，牛衣对泣的局面。此情此景，实令人愤慨。本来只打算回乡小住，仍外出谋生。由于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种无声的命令叫我留下来与家乡父老共呼吸向剥削鬼进行斗争。这是我事先也没想到的事。

我初作了一些关于甘蔗种植成本，历年蔗价等情况了解以后，乃在社会各阶层中发出不平之鸣造成舆论，争取同情，并在其中获得不少支持者，继而暗中组织同情支持者分赴各乡向蔗农宣传，发动农民起而斗争。

斗争的对象是糖坊老板，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地方的势力派。但地方势力派各派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政治态度也不一样，就是与糖业公会的联系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掌握地方势力派情况，是决定行动方针的重要依据。

当时内江地方势力派有以郭嘉仪（三青团干事长、副参议长，后为国大代表）、张德荣（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首的“党团派”，以曾佐廷（长期把持财委会、经收处）为首的“民乐派”（以开办“民乐大厦”得名）和以雷禹三为首的“正大派”（以开办一个“正大”书局为联系核心得名），另外还有一些“无派系”的官绅，虽有的人想抓到权，但都未形成重要力量。三派中欺压老百姓，作恶多端的以“党团派”为最，依次是“民乐”，“正大”。他们各自为本集团的利益互相斗争，这就是内江人常说的“内江土政潮”。

三派都与制糖公会有联系，或者他们的成员中有的本身就是糖坊老板，但三派中坐张对蔗农实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最凶狠的，则是“党团派”，尤其是郭嘉仪。郭嘉仪本身就是大糖坊老板，他的哥哥郭儒伦是直接经营者，蔗价高低直接影响到他本身利益。他在政治上

又是极端反动的家伙，蔗农与糖坊之间的斗争，他本能地会站在糖坊老板一边，并得以讨好他们捞取政治资本；又因他是最大的势力派头目，制糖公会（当时制糖公会主席是王有为）也要依仗他的势力。郭嘉仪这个问题上他跳得特别凶。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选定郭嘉仪为主要斗争对象；正因为这样，一些非"党团派"的人，有些是统治阶级里面在权力再分配中的失意者，便可袖手旁观，甚至暂时还会"站到蔗农一边"来，和我们走一段路程，其中少数正直的人，简直可以成为合作者。

在观察试探和联系中，陆续有人参加发动联络蔗农工作，我现在还记得起的，先后有当时在县政府档案室工作的黎兆奎，西区的白马、凌家、张家等乡的蔗农是派他去发动的；谢伟昭是县农会的参议员，龚家乡人，他负责龚家一带的发动工作；陈湘其是靖民乡人，他负责靖民一带的发动工作；张俊才是史家乡乡民代表，他负责史家一带的发动工作；叶荣光是田家乡人（记得是古德钦的佃户），他负责田家一带的发动工作。此外东兴乡的发动者是一位姓陈的和姓刘的，便民乡和一泗滩的发动者和联络人已记不得了。县农会参议员、县农会主席邹荣光和县农会参议员黄世乾也由于各种原因参加到后来的"内江县蔗农请愿团"工作中来。社会人士赖策群也是热心支持者。

我曾到过一些乡参加发动蔗农的会，如松柏、东兴、靖民、龚家等乡，我都去过。事先由联络人员把蔗农代表召集一起，我跟他们算帐说明压价收购、预买青山的凶狠歹毒手段，糖坊老板有制糖公会联合起来整我们，我们也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只要联合起来，糖坊老板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然就只有受宰割了。每次开会，蔗农情绪高涨，信心很高，对我也是极大的鼓舞。我到乡下去，座来回滑竿，我早晨在茶馆里喝茶，到下午我还在茶馆里，人们都不知道我在进行活动。

到十月份，各乡发动工作，大体已经完成，才派人到各乡通知在指定日期到城里集中队伍请愿。按约定日期，农民陆续从各乡来了，进城后，整齐队伍，沿街呼口号："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誓死要求增加蔗价！""我们要生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大家都带上粮食、谷草、被盖、炊具，表示长期斗争的决心。他们问到哪里集中？我告诉他们到东坝街万寿宫三青团去。指向那里主要是对最反动的三青团干事长郭嘉仪，先给他当头一棒以示群众的力量。顿时，万寿宫内挤满了，连东坝街一带的街上也都挤满农民，到处摆满柴草、炊具等。一下大约来了四千多人。县长黄希濂得报着了慌，立即派了秘书黄○○、（记不清名字）建设科长程良和几个县政府的职员来到万寿宫，向农民劝告："安心回去，政府会给你们解决的。"农民们立即异口同声的群起大声质问："何时解决？怎样解决？"轰起来了。"这样不行，我们是下了决心的，不得到解决，决不离开城里"。越闹越凶，县政府派来的人无法招呼了，下不了台。蔗农进城以后，他们很快知道了我和这次蔗农行动的关系，乃来找我商量，希望劝农民回去。因为前一年资中蔗农也因蔗价问题捣毁了县政府。他们说："这样多人集聚在城里怕出事。"我说："农民们已忍无可忍，愤怒而来，怎能毫无结果就此空手而归，哪个劝得到！"他们老是要求，我说："试劝他们一下，恐怕也得不到结果，但政府必须承诺在几天内给他们解决，如果翻盘，更加激怒了农民，他们必有更多的人又再前来，哪时就不好办，情势严重、后果就很难说了，我也无法，政府要负责啊！"秘书们承诺了。我乃告诉农民暂时回去。我们立即贴出"内江县蔗农请愿团"的牌子，办公地点设在小东门城垣的"望江楼"茶楼上。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工作，朱绩熙是蔗农运动

的老战友，他也常来一起策划。四乡蔗农代表经常来此作联系工作，互通情报，交换意见。

不久，印发了《内江县蔗农请愿团宣言》（《宣言》现存内江县档案馆）。《宣言》历陈前清糖方为发展糖业，以资金接济蔗农，扶持生产旧规，与晚近出现买卖青山积弊对比，指出这种超额剥削使蔗农无法进行再生产，造成蔗糖生产危机，成为四十万蔗农生死攸关的问题。省政府为此制定严禁预买预卖法令，乃县政府及参议会违反省府法令，废除评价制度而强行恢复预买预卖制度，反美其名曰"自由买卖"继续强行贱价收购。《宣言》声明"假预买预卖（办法）不予推翻，甘蔗不准重新议价，吾蔗农且以死争，决不许糖房砍吾辈生命所系之甘蔗；乃若倚仗金钱，横逞势力，估砍甘蔗，发生重大刑事，其责任应糖方负之"，态度很坚决。后来确也发生了因估砍甘蔗演成人命案的事。（《宣言》全文附本文后）。

过了不久，县政府召开了一个"蔗"、"糖"双方的代表，各机关、法团及社会士绅参加的会议，在县府钟鼓楼后一个小会议室开会。会议由县府秘书黄〇〇主持致词，话都偏袒"糖"方，然后就叫"糖"方代表发言，我立即反对，责他说得太孱，完全倒向"糖"方，就连说话也叫"糖"方说，"蔗农"请愿理应最先发表他们的意见，令"糖"方听，如此倒行太失体统。当时他满脸通红无言可说。我接着谴责"糖"方的残酷剥削，太无天理良心，整得农民生活活不下去，挨饥受饿痛苦不堪，还有什么理由可说。我说了一大通才终止了。"糖"方也不说话了，其余的人也默不作声。我看这样冷了场不大妙，乃向坐在餐桌我的正对面的三青团干事长郭嘉仪，用力看了他一眼，他马上站起来说话了，满口都是站在农民方面，煞有介事的说了一通。郭嘉仪的话，顿时弄得满堂莫明其妙。怎么反动的家伙会替农民说话？会议结束后，走在县政府大门时，伍心言在我背后拍一下笑着说："你老弟说得好。多年不见，还看不出来哩。"

不久糖业公会用重金请来了与糖业毫无关系而活动能量很大的钟汝为，写了一本小册子——《蔗糖真象》。这个小册子尽是一派歪曲实事的胡言。我们也立即写了一本《蔗糖真象砭》的小册子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这个小册子是由肖维年老师起草的，由我和陈湘其署名。解放后我在县长石大观处还看到过这个小册子，现在已找不到了。

到了十月底，得消息说，糖业公会已派钟汝为携巨款到成都活动去了。我感到此事不可小视，必须想法对付，乃决定也赶到成都去。当时没有钱，由黄世乾借了七十元银元作活动费，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即与另外几个农民代表赶到成都。到成都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到成都的次日是星期六（编者按：现查成都《新新新闻》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星期六载有内江蔗农派代表张匀石、段福全、李茂泽、黄书文四人来省请愿消息）。我先到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去喝茶。我在成都住的时间长，常在公园喝茶，喜欢买报，报童都认得我的，知道我每到茶馆必买报看。我刚坐下，即有报送来，我依次翻看，忽然发现一条消息报道说，昨天省务会议（省务会议每周星期五开例会）决定将原公布实行的甘蔗价格"评价"办法的议案予以撤销，改为"自由买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钟汝为到省活动的结果。看到这消息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这一着真厉害，金钱一活动竟把法案都轻轻改掉。经反复思考，认为必须先从攻破省政府这一关下手。而要攻破这一关，在当时只有诉诸舆论，借助社会力量与之斗争，逼着省政府与我们谈判。主意已定，于是在成都有名的"新蓉餐厅"订了两桌席，用"内江县蔗农请愿团"名义向成都各通讯社、报社发请贴，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些事是我的朋友余再渊（后来我们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去

办的。那一天成都各报社、通讯社记者都出席了，我作为首席代表，即席发表谈话，历述农民惨痛情景和农村经济破产景象，痛斥糖房，地主、豪霸、高利贷者绝灭人性的残酷剥削。现在农民已生活不下去，迫而向政府请愿，求助社会舆论界及明达之士予以声援。大家一面喝酒，一面议论，有的并马上写了通讯稿送回报社。第二天全城各报都报道了"内江县蔗农请愿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刊载来了，给与我们有力的支援（编者按：现查成都《新新新闻》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第十二版以《内江蔗农申诉苦况》标题，报道五日内江蔗农代表张匀石等四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概况及蔗农代表团所提三项要求。《新新新闻》报道附本文后）。

省政府看见这一消息，诧异了。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去找内江人，省参议员和我家有世谊的陈古筱先生。问陈说："怎么张某不到省府来，却在报上搞起来了？闹得满城风雨。"陈说："他在成都是经常到我这里来的，怎么这回没有来，不知道。"李告陈，要我到省政府去找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我去看陈，陈告诉我李去找他的情形。我告诉陈说，因为钟汝为用金钱活动，先入为主，把省政府买通了，竟把原来的法案都改了，我不先把此事公诸社会，怎能扭转这种形势？如不这样，他们会睬穷人吗？现在既李来找你叫我去找他，就请你先向李说，请他心如白纸，不要先入为主，也听听穷人的呼声。如果这样，我才去找他。尊意以为如何？陈笑了，说，我告诉李吧。李果然定期约我去会他。我如期到了省政府秘书处，在他的内办公室见了他。我先讲述了糖房、地主们如何残酷剥削，农村已经破产，农民的惨状已经面临饥饿，作垂死的挣扎，省府若不及早予以公平解决，前景恐不堪设想。李沉思着。我又说，有钱无钱都是省政府的老百姓，如果只是有钱人的政府，则一切法令与穷人无关，当然他们不会听。李说省务会议已作了决定怎么办？我说官场一直流行有句话："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是老官场都深知的，将议案存档不发有何不可。李忍不着笑了。他又说，那怎么办？我提出必须重新评价，必须加价。有省政府作主是好办的。李说那就这样办罢。省政府就电令第二区专员田伯施去内江主持"评价会议"（专员公署设在资中）并另函告他一定要加价，我谢了李，并恭维了他几句，然后告辞，跟即就赶回了内江，并不声不响。

十二月中旬田伯施到内江来了，住在东兴镇刘恒阳家。我去拜会了他，谈了"评价"的问题，省府给他有信，两人心照不宣，交谈很"融洽"。跟即在县政府召开了"评价会议"由"蔗""糖"双方代表，以及机关法团、地方人士参加，商讨了加价问题。"糖"方因没有"自由买卖"的根据，也就无话可说，又有专员在主持，大家只有照议。最后议定每万斤甘蔗的价格加为三十八万元。我又提议蔗农付地主的蔗租部份的加价应全部归蔗农，是蔗农争得的，地主无权享受。一场斗争就到此了结。以上内容当时曾形成了文字条款六条。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这个小小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不可能真正解决"蔗""糖"间的矛盾，解除农民的痛苦，仅仅暂时松一口气而已。不过，通过这次活动，农民的斗志提高了，感到了权势不是那么可怕的，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虽然这样，此事也只能如像沧海中一个微波慢慢地过去了。

二、刀光魔影——暗斗

前面所谈的是"明争"的方面，是人所共知，看得见听得见的。只讲"明争"的一面还不能了解其全貌，下面再讲几件幕后的"暗斗"补充之，以助人们对此有更多的了解；而且

其中有的也是很有趣味的。

（1）在蔗农要入城之前，各乡已有风声说农民要进城请愿。就在来城的头一天，郭嘉仪打电话给当时内江的警备司令龚传文，请他派兵到四门堵截。我得到这一消息，乃约了黄世乾等去会龚传文，请他不要介入地方的纠纷。农民为争蔗价请愿，乃是合理合法的正当行为，为政府明文许可，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军方介入反而容易逼出事来。况且农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进城请愿，军队也无法阻止，他们可以分散入城，不是结队而来，岂能无故断绝交通，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至于害怕出事，这点我可以负责（好大胆的冒险）。再不然在街上派几个岗哨维持秩序也可以嘛。龚传文接受了劝阻，第二天没有派兵在城门口堵截。

（2）在农民进城斗争开始后，郭嘉仪暗电重庆行辕和四川省府，说我是共产党派回内江来搞暴动的，重庆行辕即电内江特委会查明，当时在特委会负责的叫何漫时（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大特务何龙庆的侄儿）。此人我在康定一个同乡处会见过，我回内江后，偶然在街头碰见。因我是本县人，他就托我想法将他的经费能领到现金，我找到一个屠宰包商付给他。原来只是应付他而已。后来有一天（农民进城后）又在街头碰见何，他招呼我后约我到他那里去坐一坐（东坝街万寿宫戏台上，即是特委会所在地）。我到他那里后，他告诉我，郭嘉仪发电报给重庆行辕告我是共产党派回内江来搞暴动的，行辕发电报来叫清查。我不在乎的说，好哇，我是共产党，今天就坐在你面前，要捉要拿就请吧，不会"拉稀"的，你看我是不是共产党？他说："啥子共产党，现在红帽子是随便戴的。""你把我打算怎么办呢？"他说："回行辕一个电报就是了。"结果就请我代拟了一个回电，主要内容说已经查明，这件事完全是农民和糖房因甘蔗价格不合理，引起双方发生纠纷，内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回了电报，也就未再过问了。

（3）在斗争展开后，为打击郭嘉仪这个最反动的家伙，想法拉了三青团骨干分子黄钧，吉联昭等向我提供了郭嘉仪一些丑行恶事。写成了传单，但无印刷费，乃说服南街一个印刷铺的经理肖晓九，请他帮忙印几张。肖是支持我的，印好后刚交给我，就碰上郭嘉仪，我叫他到墙边说有话说。我说："刚才我碰见农民抱了一抱传单叫我看，要拿去发。我见是揭你的事，我也拿了几张。我对农民们说："不忙发，我去找郭嘉仪谈一谈，我知道他（郭）会支持你们的。"我拿出传单给郭。郭形色紧张，也不看传单，连忙说："我一定站在农民一边，千万不要发，我一定站在农民一边。"我说："你我人不同了，所以才找你，但说话要算数，就看以后的行动。如果真的兑了现，则大家都好，假如翻了盘，我也无能为力了。"郭忙着说："一定尽力，站在一边，千万不要发出去。"后来在县政府的会议上，我讲话之后，无人发言势将造成冷场，我看了郭嘉仪一眼，他马上站起来为农民谈话，而且大说一通"道理"。以一个最反动的家伙反而代表蔗农方面谈话，当时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这一幕滑稽剧就是这样导演出来的，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幕后还有一些小的斗争，就不必多说了。当时在成都读书的内江进步青年也作了请愿发传单的声援，惜我没有会见，实感遗憾了。

附一：《内江县蔗农请愿团宣言》

本县历为产蔗地区，凡我县人直接间接其生活莫不与蔗有重大关系。在满清时代，率由糖房于蔗种下之先，陆续以资金接济蔗农买粮、购种、施肥，加工、称租、纳税，而蔗价则待秋来冬初作糖清之年价而定。糖房之款并无息金，蔗亦不得先期预买。此则本县甘蔗自由买卖之向例，公平合理者也。抗战以来，物价日增，种蔗所需成本日巨，于是业糖者乘之

（其）艰难，逞资金之魔力，甘蔗预作价乃肯与以经济之接济，天旱歉收之损失全归蔗方，物价波动之损害全归蔗方，乃至蔗农之亏折愈大，糖房之利益愈多，有如天干水旱蔗农减成，糖价增高之类是也。此种买卖蔗农明知其为饮鸩止渴，愿在渴极之时，虽鸩不得不饮。然而四川省政府重视生产，尤重视多数人之生活问题。上述预买预卖有违天理，曾于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公布《修正蔗农、糖房、漏棚，预买预卖纠纷办法》规定，由各机关、法团暨有关方面及时评价以维护蔗糖双方利益，而糖房之阴谋狠计，乃不得售。此法实施已历五年，蔗糖相安，极合情势。乃本年二月，糖业公会主席又是参议员之王有为，突在参议会提议请恢复甘蔗自由买卖，妄图推翻评价。请问评价有何不便而必推翻？况蔗糖双方问题，何得以糖房一方之意为决定？如谓参议会代表农民，请问本县参议员有几席而非糖商，未经蔗方同意，以糖商而议甘蔗交易，何以异于即糖业公会之意见耶？尤可怪者，县政府建设科长程良，只提蔗、糖、漏三方采自由议价之议，不知该科长有何感想，有何冲动而与糖商一时共鸣？？冒昧呈请，其中底蕴惟有天知，社会贤达当亦不言而喻。顾彼辈虽偏颇自私，而省政府则仍持平不倚。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建字第四三九〇号之指示，解释綦详。关于自由买卖，则引办法十条之规定“蔗、糖、漏三方以甘蔗或糖清按当时的市价；以现货交易者不受评价之限制”以为训示，实但(为)准现货之交易之自由议价，而于预买预卖者未之许也，况同令后开：“该县参议会决议自由交易应准照办，惟该府对预买预卖行为必须切实严厉取缔以维蔗农利益。如将来蔗农、糖商仍有纠纷发生，可照本府前颁杜绝预买预卖纠纷办法办理”。是对于预买预卖明文取缔毫无疑议。以上所云为政府对蔗糖问题之法令规定，乃本县糖房但取令文“应准照办”，四字而置上文自由买卖之解释与限制，以及下文“对于预买预卖行为必须切实严厉取缔”于不顾，而以十一、二元乃至八、九元之贱价预买甘蔗（旧秤一万斤）。本年甘蔗生产成本，每万斤（以下均以万斤为准）需二十三、四元，在加贷款息金实达三十万元左右。今糖房乘施肥、加工需款迫切之时，指价预买利诱要挟，巧计孔多。此种亏折蔗农，何力(能)忍受！即以自由买卖之向例而言，为糖清半价，今秋水糖之现价每千公斤为二百二十万元，则旧称一千斤值一百二十万元，半价为六十余万元。再从糖房方面打算：糖价一百二十余万元，除去捐税、烧缴约四十万元，是纯蔗值为八十万元。今按照古规以糖清半价付蔗价，可获利二十万元。熬一日蔗而获二十万元之利，不为不丰。而三十四年的糖价百万元，资中即评价三十万元，本县则由糖业公会油大金钱活动多术，仅评十九万元，今糖价为去岁三倍比例，如以资中蔗价作九十万元，本县亦作六十万元。乃彼糖房贪心不足，必欲以违反天理，冲突法令之预买预卖为有效，是而可行，则明年之土不但荒芜，而吾农民之身且为枯骨！何则？今终岁种蔗不能无利反而折本，眼前即无法生存，遑论明年再事生产。凡人莫不爱其生命，凡人皆有恻隐之心。使本年甘蔗预买预卖而有效，则吾县人之丰衣足食，挥霍有余者，惟三百余家糖房而已。吾辈实地生产之农民均必转死乎沟壑，天然不但为糖房所不忍，亦为农民所不甘，更为政府所不许。诚以世间断无此理，断无此法政也。吾农或月披星，时值甘蔗成熟，生命之存亡，耕作之继续，均以土中所生之甘蔗之价值而定。假预买预卖不予推翻，甘蔗不准重新议价，吾蔗农且以死争，决不许糖房砍吾辈生命所系之甘蔗；乃若倚仗金钱，横逞势力，估砍甘蔗，发生重大刑事，其责任应糖方负之。本团除向各级政府呼吁外，更望各报馆，各机关、各界贤达主张公理正谊(义)援助。再本团所争，仅为我蔗农种之蔗之价值买卖问题，不及其他，诚恐天良丧尽之徒，横加诬蔑，合预

青年时代的范长江

黄剑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新闻战线，年轻的范长江这颗新星腾空而起，其卓越的才能和真实的通讯报道，象黑夜里突然出现的一道电闪，一声惊雷，震撼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灵，唤醒无数人投身于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他这一系列的通讯报道，并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载入史册，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几页活的历史”(1)

范长江的通讯报道，有他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敢于面对社会现实，直率地反映现实，同时，以其敏锐的思想，带着有关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索(2)，对现实加以认真的分析研究，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内在的、带根本性的东西。正如当时的一位读者兼朋友写信给他所云：“我读了你一切的通信，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一样(3)”。是的，所发现这些急待研究出解决潜在中国社会里的问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终于解决了。但是，“在这暴风雨的时代里”(4)，敢于把如此重大的社会课题公诸于世，其胆识和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那么，范长江是怎样跨入记者行列的呢？青年时代又走过一些什么样的路？有过什么样

声明以防暗箭。谨此宣言，诸惟亮察！

内江县蔗农请愿团

十月　日

附二：内江蔗农，申诉苦况(原载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六日成都《新新新闻》第十二版)

（华夏社讯）内江蔗农请愿团代表张勺石、黄书文、李茂泽、段福全等于昨（五）日假新蓉餐厅招待本市新闻界，对于参议会忽视内江四十万蔗农利益，偏袒糖商，通过自由买卖提案，预买预卖，藉以盘剥蔗农，县府□□蔽政(省)府命令，将严禁预买预卖部份，不予施行，一任糖商趁青黄不接之际，低价□买，蔗农屡次请愿，均置不理，乃派代表来省请愿。代表所提之要求，计有三项：一、本团动机，是在使内江四十万蔗农避(免)糖房的极度榨取，二、请愿□过，县政府偏袒糖房，不遵奉省府法令、实行评价和取缔预买预卖行为，特推同人来省请愿。三、今后的愿望：一、请省政府督饬县政府立刻召开评价会议；二、请省政府迅速严厉取缔买蔗行□宣布预买预卖契约无效；三、请省政府立派大员到县监督办理。

（本文接语下转38页）

的思索和追求呢？在此，笔者试图作一简要概述。

公元一九〇九年[5]，十月，范长江[6]出生在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范长江的祖辈日子也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到了他父亲范云庵那一辈，家庭已没落了，就是"有时经营一些以家庭妇女劳动为主的纺织手工业"[7]也不顺手，只好闲居于家，守着点祖业薄土，得过且过，范长江的母亲做手工活（纺线）的收入，则成了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范长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的童年有过幸福，有过忧伤，也有过为家庭艰辛困苦境况的痛苦。

范长江自小聪慧，勤奋好学，凡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因而，母亲想尽千方百计供他读书。他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攻读，1923年秋，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内江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内江县立中学。那时，学校招生，程度参差不齐，年龄悬殊很大，年长的二十岁以上，小的十三、四岁，范长江是第十六班中两名年龄最小者之一[8]。但他不甘于落后，学校在第一期考试时，他"因自己未名列前茅而暗地泡怨"，吃不好，睡不好，下决心努力赶上去，以致经常熬夜，被学监老师干预，几次受到警告，最后他终于获胜，在以后几期考试中，均名列第一[9]，"尤其是写文章，才思敏捷，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辞意并茂，誉为一班之冠[10]"。

1926年春，因学校教学设备简陋和没有正规的图书室，不能满足他在学习上的要求，他便转学到了资中四川省立第六中学继续攻读[11]。范长江读中学正值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20日至30日[12]，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支持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全国革命带来了新气象。当时，内江一些先后到外地参加革命活动的先驱者，如廖恩波[13]、谢独开[14]等，将广东、武汉、成渝等地发行的许多宣传反帝、反封建等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内江，在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中传阅。范长江在同学中借阅了这些进步刊物，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因而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15]。当时，内江的中共党组织曾派一名党员，在内江县立中学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警觉青年谈话会"，在学校开辟了图书室，陈列出《响导周报》、《中国青年》、《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等书刊。范长江是这个谈话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他常和会员们一起讨论大家所关心的"如何改造旧中国"、"社会是怎样进化的"等等问题，往往为一个问题争论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遇到适当的时候，他们便一同走出校门，在街头进行讲演和宣传。这些活动，可说是范长江走向革命人生的起点。特别是他在当时就接受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16]"这些民主革命思想，最终导致他勇于离开家乡，奔向社会去探索和追求人生的真谛。

二

1924年以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各地许多热血青年，纷纷离开家园，投身于革命洪流。1927年初，内江有一批青年到重庆报考黄埔军校，范长江得此消息后，立即赶往重庆。不意迟到了一步，黄埔军校招生工作已结束，使他十分懊悔[17]。这时，他得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在“专收各地革命青年”[18]。便去找到此时正在重庆的内江著名革命者黎冠英[19]，通过黎的介绍，进入了中法校学习[20]。

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吴玉章等同志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21]，校址在离大溪沟码头不远的地方。学校开有国文、英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课程外，还设有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等专题讲座。范长江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许多从前未学到过的知识，并以实际行为参加社会活动，和中法校的同学们一道，到街头上进行宣传讲演。至今，他的一位老同学还记得他的一段故事：一次，他在菜园坝街头作打倒军阀的宣传讲演时，军阀王陵基坐着轿子前呼后拥地走来，他毫不理会，继续讲演他的，听众也围着圈子，挡住了王陵基的去路。王陵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到是一位青年正在讲演要打倒军阀，便气势汹汹地问：“谁是军阀”？范长江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这架式就是军阀！”在场的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22]。

然而，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却在暗中勾结，企图以武力压制人民群众起来革命。1927年3月31日，即以四川军阀刘湘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在其主子蒋介石的支使下，经过密谋策划，在山城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流血惨案。这天，在中共四川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重庆莲花池省党部的领导下，数以万计的重庆各团体工人、学生以及市民，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3月24日炮击南京事件，反对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以川滇铁路作抵押，并同美孚、亚细亚、五福、聚福等外国公司密订卖国条约，购买军火，扩充反革命武装[23]等罪行。这时，那些身着便衣的反动分子，故意搞乱秩序，引起纠纷，密谋以“工学冲突[24]”为借口，使用铁尺、木棒，向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大打出手，并开枪射击。仅据1927年4月8日《国民公报》登出的消息记载，当日“城内打枪坝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25]”，由此可见惨案的严重。那天上午，长江随中法校的队伍参加到打枪坝集会，惨案发生时，学生与暴徒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长江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其他遇难者的血泊之中。最后，在战友们的扶曳下，终于死里逃生。

他从虎口脱险后，反动派又捣毁并查封了中法校，四处抓人，只好躲到姑父伍心言家。伍是清末四川通省学堂学生时在刘湘部内任职，素重范长江，藏匿了范长江。但又不敢久留在家里，反动派在继续搜捕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城。因此，他将重庆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了范长江的家里，范长江父母亲得到此消息后，万分焦急，写信要范长江立即回内江，以免家中担忧。

这时，范长江不想回内江，回内江有什么用？面对反动的黑暗势力，他需要找到解救这

黑暗，带来光明的革命真理，回去是难办到的。中国这么大，这么辽阔，这方不亮，那方亮，重庆已无立足之地，还有别的地方。他经过反复思考，定下决心，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去[26]”。

1927年初夏，范长江胸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只身离开重庆，登上了去武汉的火轮。这时，他才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在船上，他碰到中法校的两位大同学，便在两位大同学的帮助下，到了武汉，住进当时设在汉口华清街，专门接纳重庆流亡学生的湖北省立第二中学[27]。

三

1927年夏的武汉，政治形势变化异常。

范长江初到武汉时，看到这里每天都有开大会的，游行示威的，有一股子火热的气氛，使他既高兴，又兴奋，天天上街参加各种会议，游行和散发传单。一次，在法租界散传单时，还被法国巡捕拘留了几小时，只因他年纪小，问不出一点东西，才将他放了出来[28]。

然而，武汉时局的急剧变化，对于范长江来说，似乎还不甚了了。在他到武汉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大事捕杀工人和共产党人，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略知一些，理解不深透。他到武汉时，武汉还在宣传拥护汪精卫等人。但时间不久，汪精卫便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了。他不了解这些，但发现住在同一宿舍的人越来越少了，问别人，才知道政治形势在急剧变化，武汉正处在动荡之中。同宿舍的人中，有的回四川了，有的到部队去了。这时，别人问他回不回四川，他说：“不回去”。他认为回四川是没出路的，无论如何不能回四川[29]。他了解到进入部队的人中，有到贺龙军长领导的二十军学兵营的，便想起此时在学兵营任营长的内江人谢独开[30]，于是，以谢独开的关系，进入学兵营当了学兵，当天即随部队离开武汉，乘船东下，经鄂城、黄石到九江后，转乘火车到达南昌。这时，学兵营和另外两个营编为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营长仍是谢独开。

教导团驻扎在南昌城东面的新营房里，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意味着什么，范长江尚不很明白，更不知他将要参加一场举世闻名的伟大战斗。他毕竟是一名小兵。七月三十日下午，团部突然接到军部的紧急通知：“下午两点钟，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31]”团长侯镜如参加会议回团后，即接到军部命令，教导团与二十军六团换营房，教导团立即转移驻到六团驻扎的大校场营房。换营房时，团长讲了注意事项后，特别强调说：“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32]”这是为保守秘密，而从侧面向战士们暗示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但是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当晚午夜时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范长江和战友们跃身起床，着好军装，跑步到操场集合。这时，部队指挥员向大家宣布了即将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范长江和战友们振奋起来了，部队还在途中就传来了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的消息，使他们闷着一肚子的火，现在，这满腔怒火爆发之时到来了。接着，指挥员宣布起义后他们这支徒手学兵部队的任

务；“先在墙内呐喊助威，待主力部队攻入敌营后，跟上去收缴敌人武器(33)”。并告诉了大家起义时的行动信号：三声枪响；认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口令：“河山统一”。

八月一日凌晨一时，范长江所在的教导团和友邻部队，开始出动，以雷迅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围了正在甜睡的反动派的部队营房(34)。当起义信号枪一响，激烈的战斗打响后，范长江他们这批学生兵即按照布署，投入战斗。

战斗进行顺利，部队很快攻下了敌营，学兵们跟着冲进去，缴获了大批武器，运至操场中央，堆得象小山头一样，面对此情景，范长江心情激动万分，拿起枪，在操场上便欢呼雀跃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直接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党领导中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眼见人民力量强大，蒋介石立即调集南京、武汉等地的反革命军队，妄图扑灭南昌起义的火焰。起义部队在面临反革命军队包围南昌的情况下，主动撤出南昌南下。范长江随部队南移，途经抚州、瑞金、会昌、长汀、上杭等地，后抵广东潮州。战斗一个接一个，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大兵力的进攻和堵截。在沿途战斗中，起义部队受到损失，又由于敌人在沿途老百姓中制造混乱，致使起义部队难和群众接触，“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35)”加之，夏日气候炎热，起义部队内又多无军医处和卫生队，士兵沿途饮田中污水，生病者甚多，无法医治(36)。因此，造成了部队人员的不断减少，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9月底，10月初，范长江所在部队驻守潮州，遭到敌人数倍兵力的进攻，经过顽强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潮州失守，部队在撤退中冲散，使他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寻找部队，他赶到汕头，不料，部队已经撤走，只见到一些伤病员。这时，他也因于连日的作战和疲惫波奔，生活无着，兼又染上了疾病，流落于街头。后来病情日渐加重，挣扎在死亡线上，幸得他人施药，方才得救免死。

严峻的现实使范长江沉静，思索。从重庆到武汉，从武汉到南昌，从南昌到汕头，耳闻目睹，几多波折，使他处于“十分茫然，不辨方向”的困苦之中。就反对帝国主义来说，他是清醒的。但国内的问题就难辨是非了。国民党分左右派还容易理解，以后又出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捉弄人了。很显然有共产党，可他又没看到出面。尤其是在征战中，作战的双方都统称“国民革命军”而且，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张发奎部队分为了两部分，叶挺将军的第十一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与张发奎对垒作战，等等。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道理在哪里？不能盲目的走下去了，他要弄个明白再干。但是，要弄清这些问题，不是现在这种景况能办到的，在他看来，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才能解决。于是，他产生了“要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的思想。”(39)

那么，读书就需要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在那些地方有著名的高等学府，有知识渊博的教授，借助了这些，才能使人开阔视野，得到启迪，并找到一条理想之路。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谈何容易。此时此刻，他流落异乡，举目无亲，不要说读书无门，就连生活也无着落。他觉得，读书找公费学校或读半工半读都可以，关键问题是现在要生活，要治病，把这个首要的问题解决了，再寻机会接近大城市。因此，他在汕头再次进入部队的军医院，做着护兵。这样，随部队离开汕头，进入广州，后开拔江西，在部队又折回广东时，为北上达到读书目的，他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地方，脱离部队医院，北上到江西赣州，进入方

鼎英的部队做看护兵，离开江西，经浙江等地，于1928年春夏到安徽北部的涡阳，蒙城一带住扎下来。

范长江为寻找理想的道路，读书心切，历尽艰辛，却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思想支配着他，走了一段歧途。(40)。

四

范长江所在部队在安徽驻扎下来后，那些腐败的军官们，嫖赌之风盛行，弄得卫生队成了专给他们这伙败类治花柳病的场所。这使范长江极为恼火，一天也不愿在部队干下去了。恰巧，他在一张撕破了的《申报》上看到一则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招收新生的消息。上面注明，报考资格不限于正式高中毕业生，有同等学历也可以。同时注明，若考入了该校，衣、食、住宿全由公家负责(41)，这就解决了无钱上学的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便向卫生队请了长假，只身赶往南京，去报考中央党务学校。

他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不料党务校招生考期早过，需等下一期招生。这时，他身上的路费已用完，也不想再回到卫生队去。正当他身无分文，徘徊于南京街头的时候，遇到一位四川内江同乡，这真是天无绝路之人。内江同乡援助了他一些钱，并带他住进了南京的"四川会馆"，解决了他燃眉之急。

四川会馆住的多系四川的流浪青年，虽大都睡地板，但不收房租费，这对不求温饱，只求一立足之地的人来说，实在是极大的恩赐了。不久，中央党务学校招生了，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

中央党务学校系国民党所办，以培养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为目的，蒋介石兼任校长。所以，凡入校的学生，均要加入国民党，因此，范长江与其他入校学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入校后，范长江一头扎进书堆里，阅读了东、西方各国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大量的书籍。当时，学校课程也多，如政治课内容除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外，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即考茨基、伯恩施坦的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范长江集中精力学习政治、经济、论理、历史、地理、数学、英语等科，同时，还注意锻炼身体，冬天也用冷水洗澡。他在动荡的生活中，把身子拖得十分虚弱了，不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就难以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这期间的锻炼，也为他今后有健壮的身体投入社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下半年，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性质为培养国民党行政干部的大学，分行政、财经、乡村行政、外交等系，学制四年，除外交系外，其他各系基本上是培养的县长、局长，范长江他们这一期就算是学校的二年级学生。校长仍是蒋介石兼任，却未到学校来，行政大权握在CC派人物手中，教务长是当时在知识界小有名气的罗家伦。

在过去的一年里，范长江较长时间的把自己束缚在书堆里，广泛的涉猎，认真的阅读，结果思想上急待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受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些影响。一度，他对设在南京郊区燕子矶，由著名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办的晓庄师范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到那

里去参观学习。所以，在学校分系后，他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42)”。

走陶行知先生开创的治学之路，固然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实揪人心。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危机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弄得民不聊生。而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后，大权被CC派霸持着，教授业务课的教学人员大都是跑到英、美等国去镀了一层金，又溜回来贩卖外国货的洋奴才，真正读过几年书，有真才实学的人甚少，是些根本不能引导学生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进行教学的人物。范长江需要知识充实自己，但不是任人随意摆布了的人。他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所面临着的社会。国民党如此这般，中央政治学校也如此这般，他感到失望，使他原来进这所学校，是为解决思想问题，“以探求中国的前程和个人的出路(43)”的希望破灭了。特别是他当时关心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阶级”和“民族”的关系问题，思想上无法解决，使他再次处于矛盾和苦闷之中，感到自己走错了路，需要重新开始思考新的出路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沈阳，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44)”态度，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撤至山海关以南，致使日本军队占领了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又向我热河进攻。蒋介石这种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怒潮，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鼻子底下的中央政治学校却无动于衷，尤如死水一潭。范长江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的熊熊燃烧。在一天晚上，学校晚点名后，他愤然地从队列中站了出来，面对数百名同学，发表演说，怒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打破学校死气沉沉的局面。许多同学被他慷慨、悲愤、激昂的演说，触动心弦，失声痛哭起来，当即决定第二天召开大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范长江此举，带动了校内不少热血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积极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校当局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背地里却对参加宣传队的同学加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压制学生参加校外宣传活动。罗家伦还亲自找范长江进行个别谈话，从侧面施加压力。校当局的阴谋活动，使学校刚刚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活动夭折了。然而，也恰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也使范长江清醒地意识到，再不能与它们为伍了，必须立即脱离中央政治学校，脱离国民党。

这时，他想到北平去，他认为，北平是文化中心，不仅有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到了那里，半工半读，继续学习，“中国将往何去处去？我个人应往何处去(45)”，的问题总能得到解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给在北平的同乡写信，请求帮助打听北平的学校有没有可以旁听的，图书馆情况怎么样等。可是，他等不及北平同乡的回音，便匆匆决定了离校(46)。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植嫡系势力的学校，不允许自由退校，范长江便打定主意，秘密离校。于是，在几位热心同学的协助下，他利用一个星期日，在校外换掉学校发的制服，悄悄离开了南京，离开了再有一个学期就能获得毕业文凭，可以在国民党政府内轻轻捞个一官半职的中央政治学校，向北平奔去。并给校当局写了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和个人的兴趣与修养，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47)”。“把

学习离开了现实，就是等于科举时代的‘诗词歌赋’等，完全为无用之学！”[48]同时，宣布自己从此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去寻找新的前途[49]。

五

1932年元月初，22岁的范长江来到了北平。最初，他通过在中央政治学校时一位同学的哥哥的关系，找到一个住处，一边到图书馆看书，一边在黎锦熙主持下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做剪贴资料活维持生活。但是，剪贴资料活太费时间了，而且一天忙忙碌碌剪贴两、三千份，也只得到两三毛钱，难以维持生活。因此，他给北平图书馆长写信，要求进馆做一名工人，不要工资，只管食、住和业余时间让借书看，但被回绝了。他便改做面包、豆浆生意，以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殊不知，受到阻挠，生意没法做。后来到了最无办法的时候，还靠同乡的资助过日子。1932年的上半年，他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渡过的。

生活处于异常艰苦之中，他的思索之心则一刻未平息过，面对现实，回首往事，越来越多的问题萦绕在心。该打哪条路走下去呢？在不断的学习、阅读进程中，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由于哲学这个词从希腊文中一出现，就那么富于神秘的色彩——爱慕智慧。然而，他又并非那种对某一个方面的东西只求一知半解的人，既为智慧之学，那么，它的渊源，它的类门，它的流派，以及各家各派的学说与观点，是须弄清楚的，不然“智慧”从何而来。但是，要了解这些，又不能囫囵吞枣，比如，黑格尔讲的什么，康德讲的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那么生硬，看起来十分吃力，这就使他产生了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思想。1932年夏秋之际，经过几多曲折，终于如愿以偿，他进入了北大哲学系。

北大是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它拥有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和极其丰富的藏书。入校后，他即开始从头学习哲学，从希腊的到康德的、黑格尔的，以及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等方面的书籍，逐一攻读。为了读懂外文著作，他还努力攻克英语关。但是，在这样整整半年时间里，他置身于书堆里，或捧读钻研，或听教授们讲课，却没能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反而对那些东西失去了热忱。特别是在如何运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上，教授的回答，使他感到困惑。一次，在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没有钱，铺子里却有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学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50]。如果哲学仅仅是这样的，学它来干什么呢？他不愿再死钻哲学了。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一带形势急剧恶化，日军特务，卖国汉奸到处横行，国家、民族危机空前。国难当头，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投入抗战，做点与国、与民有益的实际工作。他参加了当时朱庆澜将军主持的“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工作，奔赴热河抗日前线。这是范长江的思想和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早在1929年一位先生鉴于他性情好动，学习兴趣广泛而在无意之间预言他将来恐怕要作新闻记者。这个生涯的开头，他的确也是想把自己见到的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痛苦与愤恨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51]。遗憾的是他这个头开得令人扫兴，差点儿把命丢了。

1933年2月，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组织了一批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物资，准备

用卡车经热河运往东北，范长江参加了这项工作。在离开北平之前，受人委托，挂一个“热河战地记者”的头衔，给南京《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52]。可是，运输队伍在热河凌源县即与敌相遇，战斗中，运输队被冲散，车辆，物资丢失。突然间，他成了失群的雁，孤身一人，躲进大山中，幸得一家蒙古老乡收留[53]。返回时，由于日军盘据长城各关口，不能直路返回，只好徒步横跨热河，从察哈尔转回北平。不料他和一位为他带路的蒙古老人在途中惨遭匪劫，从昏迷中醒来，蒙古老人不知去向，他艰难地独自一人走出来，又被国民党兵不问青红皂白，当做“汉奸”五花大绑起来，拖于马后，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挣扎着大声抗议，一位小军官来查明了原因，这才将他放了[54]。

此番经历，虽然事不成，对范长江却也是一次锻炼。耳闻目睹，使他既看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人民群众的疾苦，也看到了人民抗日的愤火，促使他更加坚定了参加现实斗争生活的信念。回到北平不久，他即和一些热血青年发起组织成立了“北大学生长城各口抗日将士慰问团”，先后到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冷、独石口等地，慰问抗日军队。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抗日军队中一些下层军官，了解到一些有关日军动向的情况，当他得知日军正积极准备西进察哈尔和绥远时，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使他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外人侵吞而痛心，打定主意，要再去看看祖国的那一片山河。因此，1933年6月，他只身赴绥远包头，返回北平时，跨过张家口，冯玉祥将军所部正成立抗日同盟军，召开民众大会，动员抗日。他兴致勃勃地跑去参加会议。不料，被冯玉祥将军所部的官兵误认为是“兰衣社特务”抓起来，关进警察局的监狱里，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脱下身上穿着的汗衫，咬破手指头，在汗衫上激书了：“以抗日见知于前线者，竟蒙兰衣社之诬，请亲审。此上冯先生[56]。”二十四个血字，呈冯玉祥将军，这才被释放出来。

从参加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活动到只身去绥远包头，从书斋、课堂到社会大学堂，亲身经历，使范长江对抗日军事问题特别的重视起来。从张家口脱身回到北平后，他即大量的收集，阅读、钻研中外报刊上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他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迟早会发生，提前作些研究，将来定有用处[57]。随着收集的资料不断增多，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他感到一个人的力量十分不够，便和一些热心同学商议，在北大发起成立了“1936年研究会”。其意为世界局势风云日紧，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大战的爆发估计当在1936年，“1936年研究会”就是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来研究1936年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58]。研究会并由范长江起草，拟定出研究总纲草案，在北平《晨报》上公开发表，连载了两天，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59]。研究会成立时，参加人很多，但每次开会，争论不休，致使会开不下去，也无什么效果。于是，他只好撤出研究会单个进行研究工作。

时局在一天天变化，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宣传又是一些骗人的，不真实的东西，这使范长江意识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研究工作离不开政治，不能为研究抗日军事问题而研究抗日军事问题。这样，他便把研究工作与国内的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并特别注意有关江西苏区的情况。他看了天津的《国闻周报》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从中发现，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什么“土匪”、“流寇”那些词语能代替的，他感到应该到江西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他又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出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一带不可能久守，大后方将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的结论。因此，把主要精力集中在